

论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学理论建构

○ 周全德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研究所,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在凝聚多学科智慧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建构中,社会学界贡献颇大且其研究成果颇多。通过积极参与有关城镇化问题的争论,社会学者得以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在城镇化理论建设上不断发出“社会学声音”。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学理论的成长过程。在从以小城镇为主导到以城市群为主线的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广大社会学者辛勤探索、精心求解,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城镇化研究中,我国社会学者注重社会实际调查,强调社会建设效应,在彰显社会学经世致用功能中创新和发展新型城镇化理论,向世人展示了社会学的显著特色及独特风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社会学理论建构;显著特色

一、新型城镇化社会学理论建构的背景

任何一种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均有其悠远恒长的历史背景、鲜活多样的现实背景、复杂深刻的思想文化背景。社会学对新型城镇化的理论建构也是如此。深入探讨新型城镇化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多重背景,有利于揭示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及其所可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

(一)历史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我国社会学界曾发生乡村建设学派与工业化学派的争论。那时,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在探讨强国富民道路的时候,都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

作者简介:周全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

是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针对这一问题,乡村建设学派和工业化学派都从各自的立足点出发提出了相应的农村发展之路。以梁漱溟为主要代表的乡村建设学派主张以复兴优良民族伦理文化为精神依托,从乡村建设入手重建新的社会组织。故此,这一学派对于国外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乡村的分化瓦解和强力摧残感触颇深,在思想理论上持批判立场和反对态度,而坚信惟有改良主义的乡村文化重塑和乡村组织重建,才是中国摆脱积弱积贫困境的根本出路。以吴景超为主要代表的工业化学派认为中国是人口众多且以农为本的落后型国家,因此,面对西方列强的恃强凌弱,亟待改变以农为本的立国方略,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由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带动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富民强国的现代化目标。公平地说,这两派的主张虽在学理上均有其合理性,但在付诸实施中其可行性也均未得到历史的验证。例如,乡村建设学派的改良主义主张在民族矛盾和阶级冲突相互叠加的旧中国只能是半途夭折,而工业化派的富民强国之策也终究是因不服水土而无法在中国大显身手;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均很低,国力衰弱和民生凋敝的现实依然如故。倒是费孝通先生立足现实和着眼未来,取两派之所长,避两派之所短,基于中国乡村农工互补的传统,提出以发展乡村工业为基础进而推动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发展的农村内生城镇化道路。从国际经验看,上世纪后半期,在反思传统现代化弊端的基础上全球各地兴起乡村重建运动,其中在英、法、德、美、日、韩等国获得较大成功。“二战”后拉美国盲目追随西方现代化传统发展模式,其结果酿成“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发。乡村重建运动的成功和“拉美陷阱”的教训,在客观上警示我国不能沿袭西方现代化传统发展模式及传统城市化发展方式。

(二) 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型”战略指导及城乡二元体制束缚下,我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且城市化率偏低,1979年全国工业化率为43.8%,城市化率仅为18.96%。^[1]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在新的发展理念指导及不断加快的工业化进程的带动下,开始摆脱长期徘徊不前的状态,至2013年底已达到53.73%,^[2]快速迈进现代城市化社会。中国城镇化率增长全球瞩目,但质量问题却令人堪忧。在全国7.1亿城镇化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35%,还有2.3亿农民工的问题有待解决。^[3]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经济增长成为最高目标,城镇就被看作能促进GDP不断提高的物质载体。这样一来,农村衰落、内需跌落、民生缺失、环境污染在所难免,诸多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油然而生。按照李培林的划分,中国城市化进程现已经过三个阶段:一是“非农化”(1978-1985);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城市化”(1986-2000);三是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和城市群的出现(2001至今)。^[4]问题萌发于第二阶段,显露在第三阶段:摊大饼式的城市“外延式”扩张加剧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裂性和对抗性;人口城市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在实践中变形和走样为“城乡一

样化”，强拆强建、赶农民上楼，以致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甚至致使他们中一些人的长远生计成为大问题；“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发，一方面，求学、就业、住房、医疗、养老、交通、环保等民生难题接踵而来，让不少大城市承载能力不堪其忧，另一方面，“造城运动”致使“有城无业、有城无市、有城无人”的不完全城市化现象及“乡村空心化”现象比比皆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一方面，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国内需求不足日益凸现，急需以加强城镇化建设扩大之；另一方面，“过度城市化”带来种种严重社会问题，传统城镇化道路难以为继，亟待以改善城乡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等方式另辟蹊径。国内外发展环境及形势，倒逼我国选择新型城镇化道路。

（三）思想文化背景

城镇化问题本身是一个需要多学科携手研究的宏大理论工程，而在其中社会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来，学界就我国采取何种城市化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持续进行争论。正是通过积极参与这类争论，社会学者得以增强自身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在城镇化理论建设上不断发出“社会学声音”。

单就中国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而论，在学界大致有小城镇论、大城市论、中等城市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多元发展论、城市群发展论多种理论见解。早在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他主张通过大力振兴乡镇企业和积极建设小城镇，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他的这一主张被当时的社会决策层欣然采纳且付诸实施。1989年，我国《城市规划法》第4条明确提出：“国家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5]伴随这一方针的实际执行，引发国内学界对城镇化道路的多年讨论。争论主要围绕何种城镇规模最为适宜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小城镇论”立足于我国农村人口多、所占比重大及城乡发展差距较大的基本国情，主张积极发展小城镇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及防范“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发症。持“大城市论”者认为，城市越大其规模经济效应越大，因而主张着力发展大城市以实现其在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的经济集聚效应。持“中等城市论”者认为，加快发展中等城市，既能避免大城市带来的“城市病”，又可以弥补小城镇规模集聚效应的不足，故此应将优先发展中等城市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多元发展论的学者认为，要跳出对城市规模单一考虑的狭隘眼界，结合城镇发展的规律及质量实行多元的城市化发展方针。至于城市群发展论，则是在多元发展论基础上的自然延伸及提升。综观有关我国城镇化道路选择的争论，其中持“小城镇论”和“中等城市论”观点的多为有社会学学科背景的学者，而持“大城市论”观点的学者则多半具有经济学的学科背景。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经济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更为看重城镇化的经济效应，而社会学者则更为关注城镇化的社会效益。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客观地看，中央的这一方向性定调实际上是对多种学科智慧的吸

纳和综合。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国家政策并未能真正促进中小城市的全面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化发展全面滞后于超大、特大城市。^[6]尤其是从 2008 - 2013 年,这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各种矛盾不断暴露的 5 年,也是社会各界形成城镇化发展共识的 5 年。^[7]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8]应当说,这一对城镇化过程的科学表述,已经对多年来有关城镇化道路选择及其转型发展问题,大体上做出结论,同时,这也标志着有关城镇化发展之争将告一段落,城镇化转型发展已进入理性推进的新阶段。

二、新型城镇化社会学理论建构的突出贡献

自 1979 年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社会学就分外注重从社会变迁及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探讨城镇化发展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学理论的成长过程。在从以小城镇为主导到以城市群为主线的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广大社会学者辛勤探索,精心求解,为新型城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一)对城镇化道路及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

1. 创造性地提出“内生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多元城镇化”、“人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等概念。

所谓“内生城镇化”,就是扎根于乡土社会的丰土沃壤,依托乡镇工业的坚实支撑,反映农民内在现代化追求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其原创者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他提出:“西方工业化的发展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道路的一大特点。中国当然也要顺应历史潮流,实现工业化,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绝不可能走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我们不能想象上亿乃至数亿的农民涌入城市来发展工业,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走适合自己特点的路子。”^[9]正是以农民自己兴办的乡镇企业为基础,小城镇发展生机勃勃,为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创造了良好开端。“就地城镇化”是对“内生城镇化”的拓展和提升。在“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不必离乡背井和流离失所,流入大中城市承受身份转变的磨难,也不必承受“候鸟式”往返迁徙的劳苦。相应地,“三留守”^[10]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成本和代价也得以大为降低。对于“就地城镇化”的优越性,费孝通先生归纳为“离土不离乡、离乡不背井、进厂不进城”,温铁军等概括为“立足乡土社会内生性和多样性,就近走出城乡融合的城镇化之路”,等等。“多元城镇化”是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单一城市化”发展模式而言。陈宇琳、葛天任通过分析我国城镇化基础和条件的特殊性,认为我国多元城镇化模式主要表现在“城镇规模”的多元和“推进方式”的多元两个方面。^[11]这一理论认定,无疑是社会学者依据实际国情和国际经验教训对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精辟理论概括。至于“人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概念

的形成,它们更多的是来自社会学者对促进社会健康转型发展的深刻认识。李强明确提出:“我们也可以将城镇化分为‘物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两个方面,……今日中国,城镇化第一目标或核心任务是如何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12]而在费孝通看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必须要超越以剥夺和牺牲乡村为代价来发展城市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由于“乡村工业化已经催生了城乡一体化的萌芽”,^[13]这就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致拉开城乡差距,而形成新的工业化的乡村。

2. 深刻反思旧式城镇化弊端,客观评价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严厉抨击“半城镇化”、“被城镇化”、“伪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等时弊。

在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作为责任担当的社会学者看来,我国以往的城镇化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是长期以来“外延式”和“速度型”的城镇化发展方式,累积了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如土地财政依赖、城市体系失衡、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难以持续;^[14]二是拔苗助长式的“造城运动”使农民仓促进城,让他们的未来生计成为大问题,7.1亿城镇人口中,有2.3亿农民工的问题有待解决;^[15]三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城市生活、工作压力以及相关制度障碍,使得他们普遍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16]四是“乡村空心化”,“产业空”、“青年人空”、“住房空”造成一些乡村的凋敝和衰落;^[17]五是大城市在基本民生、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等方面问题丛生,愈演愈烈的“城市病”破坏了城市的宜居性;^[18]六是在“旧城改造”的大规模拆除中,一些历史知名城镇的文脉和神韵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千城一面”的现代建筑群。^[19]

“半城镇化”是指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制约、文化隔阂等影响而不能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的一种特定状态。王春光认为:“‘半城市化’是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20]由此可见,倘若农民工群体长期处于此种状态,势必滋生诸多社会问题。“被城镇化”是指违背农民意愿使他们被迫承受“城镇化”,社会学者将此形象地喻之为“赶农民上楼”。“被城镇化”基本上是与大规模的征地运动同步而行,其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酿成失地、失业、失所的“三无”社会群体。在文军看来,“这种被市民化的结果既会给新市民群体带来许多困境,也很容易引发新的城乡冲突与潜在社会危机。”^[21]一项重要社会调查显示:在目前持农业户籍的人中,有近2/3的人不愿意转为非农户籍。^[22]而在社会学者看来,农民基于日常生活经验的这种实用理性选择无可非议。“伪城镇化”是指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和公共服务支持,以致“空城”、“鬼城”等现象四处蔓延。“土地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均是“伪城镇化”的集中体现,其显著特征是城市面积的快速扩展,以及高楼大厦的无处不在,但却毫无人气。李培林就此分析:“‘土地城镇化’出现热潮,更多是反映了土地财政的强大刺激,而不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真实需求。要警惕把‘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警惕在‘土地城镇化’中严

重损害农民利益。”^[23]显而易见,多年来社会学者对盲目“造城运动”的自觉抵制及思想理论上的批驳,已成为新型城镇化理论建构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对城镇化转型发展中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

1. 从社会建设视角审视城镇化发展,并在对其中社会矛盾和问题归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对思路 and 措施。

社会学以研究社会问题见长,社会学者通常被人们誉之为“社会医生”。聪慧的社会学者恰如高明的医生一样,他们善于发现、深究和揭示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从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经过长期艰辛的社会调查及理论探讨,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得出“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社会建设,调整社会结构的突破口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结论。^[24]在陆学艺先生看来,没有按新形势的要求改革社会体制和调整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矛盾和问题尤其是城镇化中的社会矛盾和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基于“社会医生”的天职,陆学艺先生特别强调:“城镇化属于社会建设范畴,应该遵循社会建设的规律办事,要按照社会建设的方针、原则去实现。社会建设的原则,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公平正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5]应当说,这种见解抓住了破解城镇化发展中一系列社会难题的根本。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基本民生建设问题,社会学者更是给予特别关注。著名社会学家李培林将基本民生归纳为劳动就业、收入分配、住房与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卫生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重要领域,^[26]他还点明“温饱是民生之始,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要,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社会安全是民生之盾。”^[27]这类准确界定,揭示了解决基本民生需求是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不适应、社会治理不得当等,也是严重影响城镇化健康转型发展的社会建设难题。对于这类难题,著名社会学家李强和他的研究团队进行深入探讨,从和谐发展视野将其成因归咎于“由城市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自身的不协调、城市巨变引发的农村中的不协调和城乡之间的不协调”,并且从强化城市规划中的社会规划的视角,提出“关注城市空间的社会性、保障健康、安全和住房的基本生活质量、营造宜居的人文生活环境”等应对举措。^[28]

2. 从社会冲突、社会风险视角分析城市快速扩张与农村发展不兼容现象的表征及成因,并且揭示其不良后果的严重危害性。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快速扩张与农村发展的不兼容现象逐渐浮出水面,并且其巨大风险及不良后果日益呈现。基于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学术立场,社会学者纷纷从学理上对此进行探讨。

在樊平看来,“在快速城镇化压力下,征地并村几成运动,成为社会矛盾突出的焦点,而在以土地权益流转和土地用途转换为核心的土地收益分配中,利益相关者对于村内占用资源和城市占用农村资源有强烈的排斥感和集体反抗能力,这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村的社会整合和社会秩序。”^[29]李培林认为,“没

有处理好城乡关系和忽略城乡统筹发展,是酿成‘城市病’、‘乡村病’表征及‘城乡一样化’现象的重要成因”;^[30]李强认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城镇化推进方式其人为驱动的因素比较突出,由于违背城镇化发展规律,它在超常规的速度发展中当然会产生问题”;^[31]宣晓伟认为,“城乡分割、人地分割的城镇化模式最大弊病,是以一种人所共见、人所共知的方式大规模和长时段地造成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化且固化,导致整个社会的紧张和断裂”;^[32]周雪光认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以政府为主导,而各地政府成为利益主体,追求其财政收入最大化和政绩最大化目标,由此而来,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分化、日常生活中的多方面诉求、现代通讯技术所提供的多渠道表达方式等等,与现行官僚体制的权威关系和指令传递机制存在不兼容,这难免要造成磕磕碰碰甚至引发各种摩擦和紧张局面”;^[33]王春光认为,“在‘撤并村庄’的过程中,政府将行政触角伸向市场、社会各个角落,干预市场和百姓生活,扭曲甚至取代了市场和社会运行逻辑,塑造了一个行政社会形态”。^[34]在社会学者看来,偏重于经济指标的干部选拔机制和政绩考核体系、“土地财政”等因素的消极影响,不仅造成诸多中小城镇发育不良,而且致使不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出现严重偏差。此外,他们还敏锐地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及城市三元结构、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难以及与其相对应的农村“三留守”问题,均是由城市快速扩张与农村发展不兼容而带来的不良后果。社会学者的分析和思考,对于遏制城镇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的盲目冲动及确立城镇化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其理论穿透力非同一般,其文化成效不容小视。

3. 从制度安排、社会分层、社会融入等视角,对农民工市民化进展迟缓这一难题进行社会学分析和思考。

农民工市民化本是城镇化进程中顺理成章的事情,但由于久拖不决反而成了一大社会难题,以至于中央在《全国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中特别强调:“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要求来看,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35]拿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的话来说,也就是要解决“经济接纳、社会拒入”^[36]这一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面临巨大困境的社会难题。截止到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3.73%,^[37]然而,诚如申兵所说的那样,“城市人口比重不断提高只反映了城市化的‘量’还不足以反映城市化的‘质’,只有农村迁移人口能够在城市较为稳定地就业和生活,在生活方式、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上成为城市居民,才体现了城市化的内涵和应有之义,才反映了城市化的本质。”^[38]然而,对于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来说,至今他们的这一转变尚未完成。

依照社会学者的看法,实现农村转移人口的“市民梦”、“创业梦”和“安居梦”依然存在以下障碍:一是城市三大人口群体即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外来流动人口形成了一种具有三元化特征的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利益格局;^[39]二是户籍制度接纳并不等于社会融入,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里的不融入是

“双边不融入”，既不能融入城市，也不能融入农村；^[40]三是社会阶层固化导致农民工贫困的代际传递，上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整体收入偏低、劳动合同执行不规范、社会保障水平偏低等问题；^[41]四是农民工群体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融入城市生活变得比其它方面的融入更加困难；五是城乡关系失衡及调整乏力，致使农民工市民化之路充满坎坷、荆棘，农民工身份转变深受社会资源和机会配置不公平、潜在社会排斥、社会阶层固化等不良因素的侵扰。^[42]社会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揭示社会结构不合理、社会体制不健全、社会关系不融洽、社会政策制定不得当等因素，对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难具有温室效应、增促效应及叠加效应。

4. 从辩证统一、兼容互补、和谐发展等视角，深刻论述城乡一体协调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精心谋划如何深入推进这一发展。

城乡一体协调融合发展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它集中体现了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正确价值取向、人文意蕴及城镇化道路的中国特色。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城镇化发展要经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最终走向城乡融合，融合变革的根本路径在于改造农业和转变农民。”^[4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学者在深入研究城镇化转型发展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

费孝通认为，“我们是把工业送进农村，或送到离村很近的镇上，把生活各方面的现代化也送进了农民的家里。”^[44]李培林主张，“缩小城乡差异和发展城乡一体化，应该是比城市化率更重要的标示城市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指标，……所谓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在使农民能够享有市民的生活品质和公共服务的同时，农村还能保持田园风光。”^[45]李强确信，“我国未来的城市化并不会雷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而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而且强调城市与农村的一体化，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道路，恐怕还是我们最佳的选择。”^[46]项继权提出，“我国城镇化的根本问题及其实质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问题，必须将城镇化的发展置于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下进行推进，破除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体制和二元化的城乡土地产权制度。”^[47]这些社会学者对于城乡一体协调融合发展理念的笃信和坚守，源自他们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规律及特点的深思熟虑。此外，经过多年研究，笔者认为在精心谋划如何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协调融合发展这一方面，社会学者也做出其应有贡献：其一，提出新型城镇化应以发展中小城市作为核心战略目标，以有利于消除城乡隔阂和对立、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和全面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其二，提出地方优良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标识；其三，提出从乡村向城镇的过渡型社区的社会治理问题；其四，提出在生态建设方面实现城乡协调互补的共生共荣效应。

三、新型城镇化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显著特色

(一) 注重实际调研和强调社会效应，凸显社会学经世致用功能

1. 在城镇化研究中发挥社会学调查的优势

社会学调查,是指在社会学理论指导下,运用社会学的研究程序和方法,进行资料的汇集和整理,从而得出较为科学的认识和具体工作建议的一套实践活动,其使用的方法通常有客体观察法、典型调查法、统计调查法、文献分析法、问卷法。^[48]城镇化研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诸领域的多重内容,其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非同一般。在城镇化研究中,若欲收集和整理较为全面、系统、翔实、精确的研究资料及数据,社会学调查必不可少。例如,社会学家李培林等著述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以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的第一手数据为基础;这次调查的主题是城市化,其范围涉及全国29个省的100个县,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城市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将可能是一种长期状态、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将是一个漫长过程等,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城市化进程及自觉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其意义和作用甚大。再如,社会学家李强等著述的《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和《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均以全国范围内大量定量或定性的社会调查作为坚实基础;这类颇具系统工程性质的社会调研涉及城市化的方方面面,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走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是我国最佳选择、城市化与社会结构转型交互影响、我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且主要有七种推进模式等,为城镇化理论研究者及实际工作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教益和借鉴。与其他学科的调研有所不同,社会学调查从设计到实施,始终紧紧围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适等社会学基本问题、核心问题及特殊问题而展开。换句话说,社会学调查更为关心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运行。这种特点在城镇化建设的调研活动中当然也毫不例外。

2. 为全面、客观地衡量城镇化发展质量创设社会指标

社会指标是衡量社会运行和发展过程的综合的质量和数量的标准,常用的社会指标有描述性指标和评价性指标,观察性指标和计划性指标,等等;社会指标体系是指为综合反映和说明社会或某一方面社会状况而设计的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指标,其建立方式主要有根据官方机构的相应分类而建立的规划性社会指标体系,根据社会目标建立的社会指标体系,根据某种理论建立起来的社会指标体系。^[49]社会指标的设计及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它们即是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创造性运用的产物。尤其是对于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来说,社会指标的设计及社会指标体系的建立更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以往用单一的GDP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发展成效唯一标准的惯性思维主导下,社会指标的设计及社会指标体系建立中的民生属性或和谐发展效应,往往在城镇化建设中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以致“一好遮百丑”,不断攀升的城镇化率掩盖了其快速推进中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此,将必然会影响人们对城镇化理论和实践认识的全面性、深刻性和复杂性,致使城镇化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前行。故此,李强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的著

作中,特别强调“需要将社会关注引入传统的城市规划研究中,既包括对社会群体的特征属性、真实需求的深入探知,也包括相关社会研究技术方法的扩展。”^[50]显而易见,这种基于社会学立场和观点的创意,对于实现我国城镇化速度与城镇化质量的协调,以及对于有效化解城镇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强化“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意识,展示社会学理论建构独特风采

1. 以独到的社会分析矫正单一经济思维的偏差

在以往的城镇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重经济思维轻社会思维、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应、重物质技术含量轻文化心理秉性等偏执之处。究其症结所在,无非是以 GDP 崇拜作为显著标志的传统发展观的作祟。对于城镇化研究,社会学界一开始就注重经济思维与社会思维的兼容性和互补性,竭力避免单一经济思维的偏执性。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无疑是最杰出的表率。早在上世纪 30 年代,他就将社会学家的人文情怀注入经济理性之中,期盼能弘扬中国乡村中农工互补的传统,促使乡土工业焕发生机和活力,进而开拓出一条不以牺牲农村农业农民为代价的平和的现代化之路。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他更是融浓郁的民生情怀与科学发展的战略和策略为一体,看重农村乡镇工业自身变革潜力及农民自身现代化的历史原创性,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乡村城镇化道路而摇旗呐喊。现在看来,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应的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导的城镇化战略策略,在当时是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正确选择。这一正确选择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期为缓解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为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打下牢固基础。自然,与大中城市相比,小城镇的聚集经济效益较弱,故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小城镇受到冷遇。与此同时,大中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在“民工潮”和“土地财政”的双重推动下,开始了外延式扩张性发展。其结果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城市病”和“乡村病”并发,社会问题丛生,文化特色消失,环境生态令人担忧。事实证明:单一经济思维及其实用主义理性倾向,并不能引导城镇化建设走上健康有序发展的科学大道,而社会思维与经济思维的融合以及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对于走出一条新型城镇化之路,则是不可或缺的致胜法宝。

2. 在新型城镇化理论创新和发展中彰显社会学的显著特色

社会运行、社会转型、社会互构、社会断裂等是郑杭生、陆学艺、孙立平等著名社会学家基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理论创造;这类理论创造富有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学家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理念。社会资本、社会排斥、风险社会、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等理念,则是国外社会学家在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研究中的理论创造,可以为我国社会学者所借鉴和参照,用于深入探讨国内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在城镇化研究中,依据上述理论和方法,我国社会学者致力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学理论建构,向世人展示了社会学的以下显著特色:

其一,弘扬原创性,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积极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之路,其首创的理论话语发人深思,譬如“小城镇、大问题”,“城镇化引领国家新成长阶段”,“实现农民、农民工的城镇化”等。我国社会学者竭力主张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人口空间地理位置的移动、居住环境、就业方式及生活条件的改变,而且是人的社会本质及文化性格的改变。就此而论,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就是以统筹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的构思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可通融性,从而有可能通过城乡文明的交融互补,型塑新型现代性的文化类型。

其二,坚持“以我为主”,以强化社会思维为主导,深刻认识新型城镇化的本质体现是社会关系建构而不是物质技术形态建构。我国社会学者看到,在两种建构的形神关系中,社会关系建构是核心,是决定新型城镇化价值内涵及基本走向的要素。因此,他们主张在新型城镇化理论创新过程中,不仅要运用经济思维观察其物质技术形态建构之“形”,而且要善用社会思维揭示其社会关系建构之“神”,以便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这一理论体系。

其三,突出问题意识,以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客观审视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问题及风险并给予理论概括,譬如“阶层固化”、“社会结构转型: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城市三元社会结构及其利益格局”等。快速城市化与农村发展的不兼容诱发诸多社会问题,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的交互影响和作用滋生不少社会失衡现象。正是这些问题和现象激发了社会学者的思想想象力和理论创造欲,促使他们就城镇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问题进行前瞻性理论思考及探求应对策略,譬如他们提出了“确保‘底线公平’”、“重视‘底层精英’”、“从精英思维转向理性妥协思维”、“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等。

其四,凸现学科的经世致用功能,竭诚服务于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一是以在城镇化进程中更好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旨,围绕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各项目标任务,探讨在促进城市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合力。二是以促进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为主线,围绕社会学核心问题即社会结构转型问题,探讨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中在基本民生建设、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合理配置问题。三是以有效化解农民工融入城市难及切实保障城市弱势群体权益为主题,围绕以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务,探讨城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互构过程中的个体身份、社区关联、区隔与分化、权利诉求等社会问题。四是以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着力点,围绕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各项目标任务,探讨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降低社会治理成本等理论问题。

其五,着力于理论穿透,以社会运行、社会转型和社会互构等综合视角,将城镇化看成引起深刻社会变革的行动与结构的互动过程,揭示传统城镇化思维的两歧性和直线性,揭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难的实质是由社会结构建构不合理所决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配置的不公平。从社会学视角看,新型城镇化就是

要以科学方式有效化解城乡两元结构之痼疾及城市三元社会结构之弊端,此乃优化城乡社会结构及完善城乡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之路。在社会学者看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性标志,而在其进程中促使城乡社会结构合理建构及社会资源和机会公平配置,则是其中心任务。

其六,强调社会效益,以高度的思想警觉和理论担当,积极回应城镇化进程中有违民意、有失公正、有损民生的思想行为及理论倾向的挑战。在城镇化发展道路选择之争从偏重于城镇规模效应向注重城镇发展质量的转变中,由于对幸福民生与社会和谐的特别关注,与其它学科相比,在思想创意和理论创新上社会学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七,阐明新型城镇化的真谛,揭示新型城镇化的生机和活力在于以人的发展作为核心价值取向,而旧式城镇化难以为继的主因则在于见物不见人、忽略人的发展。就努力实现人的城镇化而言,社会学者紧紧围绕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这一社会学基本问题及社会结构转型这一核心命题,致力于在城镇化进程中达致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

其八,倡导交融互补,以宽宏的思想包容和有机的理论融会,积极借鉴和吸纳各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其有益成果。在城镇化研究中,社会学工作者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学想象力。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也就是对于社会生活状况、社会事件内幕及社会发展态势的洞察能力及判断能力。这种能力将哲学的慎思明辨、经济学的一丝不苟、历史学的老成持重、政治学的审时度势、法律学的严明公正、心理学的感同身受融会贯通,致使社会学者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在实际研究工作中受益匪浅。正是得益于与其他学科的学术交流、碰撞和沟通,在城镇化研究中社会学者才能得心应手地对城镇化建设的“中国经验”,进行思想概括和理论提升。

注释:

[1]陈甬军:《中国城市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页。

[2]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4年2月24日。

[3][7]冯奎:《迎接新一轮城镇化发展黄金期》,《经济要参》2014年第1期。

[4][17][23][30][45]李培林等:《当前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14,13,11-14,6,291页。

[5]陈甬军、景普秋等:《中国城镇化道路新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页。

[6][11][12][31][40]李强等:《多元城镇化与中国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7-248,17-19,3-4,3,307-326页。

[8]新华社:《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

[9]费孝通:《中国城镇化道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8、271页。

[10]在此是指农村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

[13]转引沈关宝:《〈小城镇,大问题〉与当前城镇化发展》,《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4]王方:《发展中小城市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城乡建设》2014年第1期。

[15]冯奎:《如何理解城镇化发展的“温度”与“速度”?》,《中国发展观察》2014年第1期。

- [16] 迟福林:《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南方日报》,2011年3月6日。
- [18] 王仁贵等:《中国“城市病”凸显,如何在城市过尊严生活?》,《瞭望新闻周刊》,2010年9月25日。
- [19] 倪邦文:《城市化与受伤的城市文化》,《读书》2009年第5期。
- [20]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 [21] 文军:《“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 [22] 梁平:《三分之二农业户籍人口不愿转为非农户口》,《中国青年报》,2014年4月17日。
- [24]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页。
- [25] 陆学艺:《遵循社会建设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载《2013年中国社会学年会分论坛: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论文集》,2013年7月,贵阳。
- [26]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5页。
- [27] 李培林:《当代中国民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页。
- [28][46][50] 李强:《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11、319-348、11、320页。
- [29] 樊平:《我国当前的农村社会形势和农民阶层》,载《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61、271页。
- [32] 宣晓伟:《新型城镇化的逻辑》,《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3月2日。
- [33] 周雪光:《社会建设之我见:趋势、挑战与契机》,《社会》2013年第1期。
- [34] 王春光:《城市化中的“撤并村庄”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
- [35] 新华社:《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4日。
- [36] 郑杭生:《农民工市民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课题》,《广州公共管理评论》2013年第1期。
- [37] 国家统计局:《2013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http://news.163.com/14/0224/10/9LREE0HA00014JB5.html,2014-2-24。
- [38] 中兵:《对我国城市化阶段特征的重新认识》,《宏观经济管理》2013年第6期。
- [39] 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红旗文稿》2013年第20期。
- [41] 张鸿雁:《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创新》,《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3期。
- [42] 李怀玉:《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分析》,《理论动态》第1990期,2014年3月30日。
- [43] 何磊、曹钢、杨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城镇化思想及启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1期。
- [44] 费孝通:《中国城镇化道路》,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
- [47] 项继权:《城镇化的“中国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 [48][49]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18页。

[责任编辑:书缘]